

環保人士與社會人格

陳玉峯

薄暮時分，當我從小飛機窗口眺望暮靄凝重中的落日，冬季特有的蕭瑟樣相，竟教日落如沉船，倏忽隱沒，不留一抹殘紅，而西天曠茫經灰濛轉黑暗。1999年2月10日，我來回中北兩都會，到監察院、農委會，並與如今碩果僅存的幾位環保老戰友聚談。下午時段，農委會終於正式宣佈，棲蘭伐木案第三期計劃停止，而第二期作業至今年6月結束，連續半年來的用心用力，似乎有了初步的結果，但我絕不會低估邪靈餘孽可能性的勢力，以及反噬殘林種種使壞的手段，我的心情無法放鬆，我們絲毫沒有改變共業圈的價值觀與認知，最最恐怖的「專業、專家、權威、威權與既得利益者」的心智狀態，才是隱憂與潛禍。

中午，我們聚集在台大校友會館，商討棲蘭案與這一年台灣環境諸議題，阿標丟出「環保人士」的「貞節性」問題，帶著台灣人慣有的格局與宿命，惹得整圈人搖頭太息。高教授背負多條違反集會遊行法的「通緝」與沉重的「公債」，滿是無奈與無辜；平素最為平和理性的法師只能眉皺肩聳；聖崇被逼急了，偶而拋出賭氣話；我大抵沉默，因為想來想去，從未有所「得」，無從言「失」；張教授則苦口婆心，展現一貫的柔軟，娓娓勸慰著阿標；心欣在旁瞪著大眼，不知這番會議記錄從何下筆。

會談間偶提及什麼「委員」或學者可參贊棲蘭案，張教授有所感慨的說某某只是……，「割稻仔尾的」我接口，大家都首肯，眼前這票開路機似的「傻瓜」畢竟太少，通常衝撞得遍體鱗傷而孤零無奈之際，一回頭卻看到一大票收割者正在「分贓」，這似乎是台灣的「常態」。十多年來，大多數環保運動者本身並非受害者或直接受害者，之所以挺身而出，泰半係基於公義、打抱不平與認知，但台灣一直罕見基於信仰、理念、遠見與寬廣無私的社會人格者在從事，加上十多年政經社會變動太迅速，欠缺信仰理念根基的環保或社會運動者，大多被政治、政黨、基金會之類的單位所收編，再因社會價值觀劇烈變化，老一輩無怨無悔

的付出模式無能隔代遺傳，更恰當的說，老一輩環保人士應該具備善巧方便智能，「隨俗種種開演」，不斷導引啟迪或培育出信仰型的新秀，至於寄望於所謂學者、專家，我始終認為是緣木求魚。

為何如是說？我出身學界、從事純學術研究二十餘年，幸虧早就逃離台灣體制內的學術圈，也努力的不要成為所謂的「學者、專家」，甚至於提醒學生，專家只不過是對少之又少的細節，懂得多之又多的科技匠，欠缺整體觀與橫向溝通的智能，卻常是自我中心型的自閉症，或專業狹心症與偏執狂。問題不在這些專家、學者本身，而在產生專家、學者的教育本質與過程。

棲蘭案反映創造專家、學者過程的根本問題之冰山一小角，讓我想起 D. W. Orr 論及「科學的問題與問題的學科」中所下的批判。他抨擊制式教育生產制式思考的專家，導致罐頭心智、生態破壞、全球失衡；這些既得利益者的言行不一，面對困境僅止於知識的一知半解，不能感同身受，遑論行動。他說：「如果這只是知識的不足，倒易改善，然而，更大的失敗是在教育過程中，未能以情感、忠誠和智識，投入當地的生態，導致心靈無法和自然結合……。專業知識不能使人忠於鄉土、忠於地球或忠於我們的感受，而是對抽象的學科忠心耿耿……」

他復舉 A. Mermann 對學科過度孤高窄化的見解：「審慎的研究和正確的報告出爐了，傑出的雜誌刊登著林林總總的論著，但實際參與問題，努力改善的實證卻少得可憐……，長期以來，對於須要承諾與犧牲的艱困任務卻竭力避免……，我們發覺，光用我們的心智及資源，來解決知識上的問題輕鬆容易，因為我們逃避了人們相互依賴的負擔，以及身為人的天賦債務」，Orr 更直接批判學校、學者、專家「盡量避免事多利少的任務，即令他們接受這些任務，也只將其當成研究，並非全力投入實際問題的解決」，資本主義自由的先進國家如此，台灣這等低級、詐騙的研究水準，又能作何道德、良知的要求？！

在這片土地上空二千多米的回想，自己經歷多少的社會淬鍊，接觸多少不同價值觀族群的衝擊，好不容易才擺脫象牙塔自閉狂妄症，學得平等心，而遠離不斷複製自己的專家界，如 Orr 的批判，就我而言，係

將其歸結為知識欠缺內化，無法同價值、生活與情感世界合一。坦白說，台灣的學者專家獲得這社會過度的尊重，卻分擔太少的責任，也付出偏低的關懷，甚至於養出了一大票顛倒是非的睜眼瞎子，唉！自己似乎也是位列如此的既得利益群，如何避免淪為賊字輩，毋寧是自我反省的要項！